

明清之际岭南 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

邹振环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200433)

[摘要]天主教教堂作为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 其中蕴涵着西方文化多种形态的要素。本文通过明清之际教堂建筑在“东方梵蒂冈”澳门的登陆、教堂文化中的洋乐和洋画、教堂文化中的钟和酒制作技术等分析, 揭示了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 最先在那里登陆的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同时也是展示西方知识的最直观的一个窗口。教堂文化不仅给岭南人带来了西方的艺术和民俗景观, 而且也成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岭南成功引进的教堂文化, 后来随着西洋传教士的北上, 而沿着交通线推向了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 把包括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等在北京扎下了根, 为清代艺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关键词]明清之际 教堂文化 岭南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11-0073-11

天主教教堂作为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 其中蕴涵着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观念、建筑造型、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工艺制作、语言文字等多种文化的要素, 是以表现天主教观念, 宣扬宗教教理, 与天主教仪式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形态。它是天主教观念、感情、精神、仪式、艺术和工艺多种元素的结合体。在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 教堂文化作为西方文化形态的代表, 最先在中国传播并引发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 西方的教堂文化也就最先在那里登陆, 并通过岭南沿着交通线北上, 最终成为明清之际北京乃至全国的一大重要文化景观。本文拟通过明清之际在岭南传播和形成的教堂文化结构的分析, 阐述教堂文化如何通过岭南, 沿着交通线推向政治与文化中心京城的过程; 论文试图对教堂文化所引发的中西两种文化冲突与交融作出若干分析。

一、“东方梵蒂冈”的教堂建筑

地理大发现把葡萄牙人带到了中国。1497年,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 开辟了联结东西方的新航道, 1513年首次抵达中国沿海。据《明实录·熹宗实录》、《明史》、《澳门记略》等文献的记载,

广东官府于1535年允许外国商船入泊澳门一带。

《广东通志》卷69《澳门》条称: 葡萄牙人在1553年借口商船触风涛缝裂, 水湿贡物, 要借澳门一带晾晒, 并通过贿赂海道副使汪柏获得了允许, 开始只是搭建一些帐篷, 后来索性“运砖瓦木石为屋, 若聚落然。”实际上将澳门变成了葡人的居留地。

1555年葡萄牙传教士贡萨尔维斯抵澳后, 建造了一所草屋, 作为当地的第一座教堂。^①有学者称葡萄牙籍耶稣会士Franciscus Perez, Emmanuel Teixeira, Andreas Pinto等于嘉靖四十年(1562)一月二十六日初抵澳门, 曾在圣安多尼堂附近建一简陋小教堂, 覆以稻草, 名天主之母堂(Igreja de Madre de Deus)。^②以后来华的传教士陆续增多, 他们在澳门建造了众多的教堂、修道院以及圣克莱修女院。较早的可能要算是建于隆庆元年(1567)的圣安多尼堂(Igreja de Sao Antonio), 澳人称其为花王庙。

《澳门记略》称: “北隅一庙, 凡蕃人男女相悦, 诣神盟誓, 毕, 僧为卜吉完娶, 名曰花王庙。”^③1569年, 澳门主教Melchoir Carneiro建仁慈堂、拉法医院和麻疯院, 并于麻疯院附近建造了辣椒拉堂,

又称望德堂 (Igreja de Lazaro)。1576年1月23日,望德堂被罗马教皇宣布为澳门教区成立后的第一座主教座堂。每逢新任主教到达澳门就职,都必须先到望德堂领取法杖,然后方被认为有权行使主教职权。1569年贾尼老主教在该堂后侧建麻疯院附堂,因此,该堂又被澳人称为“麻疯庙”、“疯人堂”、“发疯寺”。该堂主楼两层、钟楼三层,主楼顶部为两层弧形状,较三角形活泼。^④被称为澳门最古的教堂还有建于1575年的圣老楞佐堂 (Igreja de Sao Lourenco),该堂建于一高台基上,中央为两层,底层开大门,三角尖屋顶。两厢为三层楼,平顶,其三楼一边为敞开式的门洞,挂一口钟,是为铜钟楼,一边则镶有一架大报时钟,为自鸣钟。整个教堂建于南湾山坡上,当时其旁边有风信旗杆,华人便称此堂为“风信庙”或“风信堂”,之后有谐音为“风顺堂”。^⑤《澳门记略》称:“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曰跋其归,祈风信于此。”万历十五年(1587)四月,西班牙圣多明我会教士建有圣多明我堂 (Igreja de Sao Domingos),七月他们又建有玫瑰圣母会院,作为对华传教的总部。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奥斯定会会士 Francisus Manrique 等奉命从马尼拉来澳,1589年建有圣奥斯定堂 (Igreja de Sao Agostinho)。澳人称其为龙嵩庙。《澳门记略》称:“龙嵩庙者,在澳西北。初,庙就圯,或覆之以蓑,须松如髯龙。后庙钟不击自鸣。众神之,恢崇其制,仍呼为龙嵩庙。”^⑥

1565年澳门建立了圣保禄公学,利玛窦等来华的耶稣会士曾在其中学习汉语。1594年圣保禄公学升格为学院,12月1日圣保禄学院正式成立,这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模式第一次在澳门的移植。从1602年起,花了35年的时间,建成圣保禄教堂 (Igreja de Sao Paulo),俗称“三巴寺”,又称大三巴。该教堂堪称澳门,乃至岭南教堂中最有特色的教堂建筑,也是当时远东最宏伟、最壮丽的天主教堂。该堂高50米,矗立在70级台阶之上,气宇轩昂,前壁有十根石柱并列,高四层,最上为三角形屋顶,紧连的教堂中心是个大圆顶,是散布在世界的几座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代表之一。这是传教士在澳门建立的第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建筑,尔后通过澳门的传教士又把这种建筑风格传入中国各

地。《澳门记略》中有这样的描写:“寺首三巴,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作雕镂,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倚疏瑰丽。”1900年刊行的清初文学家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2中也有对该寺的描述:“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楼,雕镂奢丽,奉耶稣为天主。……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⑦三巴寺下还建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称“专为唐人进教之所……以行医为名,实为传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斋四十九日,名曰封斋。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礼拜之后,有即行返棹者,有留连二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礼拜。”^⑧

与“大三巴”相对应的是“小三巴”圣若瑟堂 (Igreja de Sao Jose)。该堂筹办于1728年,奠基于1746年,1758年建成。《澳门记略》中记有:“澳西有小三巴寺,規制差约(大三巴)而轩豁过之,三巴之外库也。”圣若瑟教堂仿照古代巴比伦式,建筑宏伟,气势磅礴,只有正堂,左右两边建有对称的钟楼,形为琉璃瓦檐的小方塔。教堂中央是一巨形圆顶,光线通过玻璃射入,教堂内部圣殿仿效罗马圣伯多禄大殿,金碧辉煌,浮雕栩栩如生,气派非凡。有称“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可见大小三巴在澳门的影响之大。

其他还有望人庙、支粮庙、尼寺等,正如屈大均所言,站在山顶上,是“东望洋寺,西望洋寺。”^⑨18世纪初即耶世宁来华时,澳门已是一座拥有25座教堂的城市了。^⑩这些天主教堂大都为两层或三层的西式建筑物,而当时澳门的民居多为低矮的房屋,因此这些教堂建筑,更显得雄伟高耸、富丽堂皇。这些16世纪末17世纪初建造的教堂,在建筑风格上具有当时罗马教廷盛行的“巴洛克”风格,其庄严高贵,气势雄伟,有强烈的动感,注重光的效果。圣保禄教堂是这种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教堂建筑构成了澳门独特的教堂文化的基础,使澳门充满了宗教的氛围和欧洲的情调,无怪乎澳门有“东方梵蒂冈”之称。面对金碧辉煌和巍峨壮观的教堂,清代的文人发出过由衷的赞叹。顺治十

二年至康熙元年(1655—1662)任番禺教谕的陈衍虞,在其《由香山径入濠镜澳遍游天主寺》中描写了教堂建筑高峻神秘的气氛:“岌岌列宝坊,金壁竞崎丽。……寺魂逼目光,常恐迟即逝。”^⑩

建筑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宗教建筑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际西方宗教建筑最初在岭南出现,后又延伸到中国政治的中心北京,甚至蔓延到皇室内部,如康熙儿子苏努亲王的第十子保禄亲王,即在自己的府邸造了一座中西式教堂。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观后,称赞是自己在在中国所看到的最美丽的教堂:“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把它置放在欧洲某位君王的王宫里也一定不会使之逊色。保禄亲王特意选了一块僻静的地方砌了一道美丽的围墙,一点没有破坏王府原来的格局。从一道漂亮的大门进入讲堂,首先看到一个三法尺高的平台,很宽很深,铺着白色的石块,平台周围砌了整齐的旧抛光上釉熠熠发亮的砖,整个平台看来好像是一整块石似的,平台后面是教堂的主建筑。它的木构架、门窗,不管镀金的油漆的都金碧辉煌,它的楼角上的砖瓦石块都经过艺术加工,有许多中国式的点缀。屋顶上镂空花纹繁多,却一尘不染。”^⑪教堂建筑作为天主教活动的场所,被赋予了灵性和神力;其中作为建筑艺术构成部分的雕刻和绘画,以写实、象征和寓意的手段表现了天主教的基本内涵,不仅激发了信徒虔诚的宗教感情,而且让中国观者第一次接触了西方文明的精华。

二、教堂文化中的洋乐与洋画

澳门作为西风东渐的第一站,也是洋乐最早登陆的地方。而洋乐的东渐又与天主教堂有着密切的关联。裴化行著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记载1563年圣主日内——复活前之一星期(4月4日)举行庆祝圣母味落尼加(Ste. Veronique)游行大会,……恭奉圣体在市内游行,以音乐舞蹈相伴……。万历年间王临亨在《粤剑编》中记道:“澳中夷人……有自然乐、自然漏。制一木柜,中真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核,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拨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⑫陶亚兵认为“自然乐”应是管风琴和古钢琴无疑,文中记录的是小型的柜式管风琴。^⑬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

录了澳门三巴寺所见西洋乐器:“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寺有风乐,藏革柜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呜呜自柜出,音繁节促,若八音并直,以合经呗,甚可听。”^⑭《澳门记略》的注释中有梁迪《西洋风琴诗》用诗歌描绘了作者在澳门三巴寺所听西乐的感受:“西洋风琴似风笙。两翼参差做凤形。青金铸筒当编竹,短长大小递相承。以木带匏囊用革,一提一压风旋生。风生簧动众窍发,牙签噉击音砰訇。奏之三巴层楼上,十里内外咸闻声。声非丝桐乃金石,入微出壮盈太清。传闻岛(大弓)多拱桥,风琴之作亦其征。”梁迪的《西堂集·外国竹枝词》卷2还有对西洋乐的描述:“幽如剪刀裁绣阁,清如鹤鹤啖青冥,和如莺燕啼红树,哀如猿猴吟翠屏。或如边关展角吹,或如军垒夜传砦。或如寒凉泻三叠,水帘洞口流瑰琦。或如江涛奔万马,石钟山下闻噌吰。过如狮吼莲花座,裂石破天云震惊。或如龙吟水晶阙,老鱼瘦蛟舞纵横。”^⑮

清初有不少学者是通过教堂接触洋乐的。如清初著名的画家吴历(1632—1718)在澳门也接触过洋乐。在《三巴集》中记有“状点冬山齐庆贺,黑人舞足应琵琶”。他的原注有“黑人歌唱,舞足与琵琶相应,在耶稣圣诞前后。”陶亚兵认为所谓“琵琶”恐怕是指小提琴或吉他琴。吴历还著有《天乐正音谱》,其中有教堂中弥撒音乐、称颂圣母乐章、敬谢天主钧天乐、喻罪乐章、悲思世乐章、警傲乐章、戒心乐章、咏规程、悲魔傲等。显然这是为了配合天主教弥撒或赞美诗的歌曲旋律而作的歌词。赵翼的《簞曝杂记》卷2这样记载过北京教堂里的西琴和西乐:南堂“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髯者坐而鼓琴,则笙、箫、磬、笛、钟、鼓、铙、镯之声,无一不备。其法设木架于楼,架之上悬铅管数十,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嘴以作气。气在夹板中尽趋于铅管下之缝,由缝直达于管。管各有一铜丝系于琴弦。虬髯者拨弦,则各丝自抽顿其管中之关挾而发响矣。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窍,以像诸乐之声。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巧也。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绝。”^⑯教堂音乐中有了为了适

应忏悔者的心灵需要而采用的比较哀伤的旋律，也有礼拜仪式中肃穆的清唱和合唱，更有节庆时活泼欢快的节奏。风琴伴奏的对神的赞歌，不仅净化了像吴历这样的信徒；余音缭绕的庄严的旋律，也拨动了像赵翼这样的音乐爱好者的弦。

明末传入的西洋造型艺术，其中绝大部分也属于教堂中的宗教绘画和雕塑，如《澳门记略》中这样描写三巴寺中的绘画和雕刻：“寺首三巴，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作雕镂，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绮疏瑰丽。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貌如少女。抱一婴儿，曰天主耶稣，衣非缝制，自顶被体，皆采饰平画，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许人，左手执浑天仪，右叉指若方论说状。眉须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重轮，鼻隆准，目若瞠，口若声。”“三巴寺有海洋全图，有纸画、有皮画、皮扇面画、玻璃诸器画。其楼台宫室人物，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珞琅人物山水画，织成故事画、绣花画。”其他像发疯寺（望德堂）中“所奉天主有诞生图、被难图、飞升图。其说以耶稣行教至一国，国人裸而缚之十字木架，钉其首及四肢，三日甦，飞还本国，更越四十日而上升。年三十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演说，岁中天主出游三巴，则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粮，三月大庙，则二月五月六月，凡三出游，率先夕诣龙嵩庙，迎像至本寺，然灯达旦，涣众必集，黑奴异被难像前行，蕃童诵咒随之，又以蕃童像天神披发而翼，来往腾越，诸僧手香烛步其后又用老僧抱一耶稣像，上张锦棚如前仪。岁三月十五日为主难日，寺钟宵鸣，越十七日复鸣，诸蕃彻酒肉三日，虽果饵啖不至饱。”^⑥

清廷中最有名的画家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他少年时代受艺于著名的艺术家安德列亚·波茨，后者因为完成了位于罗马的圣·依纳爵教堂的天花板和圆屋顶的绘画工作而声誉非凡。1707年，19岁的郎世宁加入耶稣会，期间他为热那亚会院的小教堂画了两幅表现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的油画，题为《圣·依纳爵在曼里萨山洞》和《嫉妒在依纳爵面前显圣》。以后他在热那亚的马丁内

斯歌剧院画过一组大型油画，在葡萄牙的哥因不拉又为耶稣会修道院画过多幅壁画，甚至为葡萄牙太子绘过肖像。1715年到达澳门，同年来到北京，住在东堂。据哈蒙神甫的《耶稣圣心敬礼史》称，郎世宁曾绘过多幅耶稣圣心像，最精美的曾供奉在东堂的圣心祭台上。后来这些圣心像曾刻印若干，分赠欧洲各国，而以葡萄牙最多。1741年，东堂的监造者费隐神甫还将郎世宁绘的圣心像，寄送欧洲某传教士，嘱在维也纳或奥格斯堡刻板制像，可见郎世宁在东堂绘的耶稣圣心像确是不可多得的杰作。^⑦1721年，郎世宁为东堂新扩建的工程绘制装饰画，他创作了《君士坦丁大帝作战图》和《得胜图》。1757年，已经69岁高龄的郎世宁还为南堂完成了四幅壁画。其中有与为东堂所绘相似的《君士坦丁大帝凯旋图》和《大帝赖十字架得胜》。对这些壁画，清代的学者有过记述，如赵文恪《慎轩榆巢杂识》说：“崇文门（应是玄武门）内天主堂，建在康熙年间。乾隆时重修，客厅东西两壁画人马凯旋之状。堂内供奉彼国圣人，皆画图全相，四围男女老少聚集嬉戏，千态万状，奕奕如生。”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有如下的描绘：“南堂内有郎士宁线法画二张，张于厅事东、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闭一目以窥东壁，则曲房洞敞，珠帘尽卷，南窗半启，日光在地。牙签玉轴，森然满架。”^⑧教堂绘画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让中国人步入教堂，犹如置身天堂；其宏大的造型，和谐的色彩和辉煌的线条，不仅有助于教徒对上帝的敬意，而且大大促进了西洋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三、教堂文化的制钟和酿酒

西洋奇器中最令明清之际中国人感兴趣的东西之一是钟表。西洋钟表，最早也是从澳门传入的，并和教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万历时王临亨尝至澳门，其《粤剑编》卷三《志外夷》首记澳门葡人的自鸣钟：钟以铜为之，而能按时发声。三巴寺也有自鸣钟。《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称“三巴寺有十二辰盘，揭之定时台前，俟某时钟动，则蟾蜍移指某位。自鸣钟有数种，曰桌钟、曰挂钟，小者圆如银铤，皆按时发声，起子末一声，至午初十二声复起，午末一声至子初十二声鸣时，八音并奏者，谓之乐钟。欲知其辰而非其应鸣之时，则制绳

转机而报响，谓之问钟。小者亦可问自行表，大小铜日规、月影以及玳瑁诸器。”^④

关于三巴寺的钟楼上安有一座远东罕见的大钟，《澳门记略》有这样的描写：“（三巴寺）上有楼，藏诸乐器。有定时台，巨钟覆其下，立飞仙台隅，为击撞形，以机转之，按时发响。”印光任有《三巴晓钟诗》即叹此钟：“疏钟来远寺，籁静一声闲，带月清沉海，和云冷度山，五更昏晓际，万象有无间，试象番寺问，曾能识此关。”释迹删《三巴寺诗》也写道：“六时钟韵杂风琴”；“暂列殊方物色新，短衣长屐称文身。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箬叶编成夸皂盖，檀舆乘出比朱轮。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羨休离礼拜频。”李遐龄“钟鸣月上三巴寺”等诗句，^⑤描写了教堂的钟声与寺庙的晨钟暮鼓之声此起彼伏的澳门奇景。

西方的制钟技术后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应用技术在中国生了根。罗明坚与利玛窦等来华时，都带有自鸣钟。1582年罗明坚将一台有车轮的大自鸣钟送给了广东制台陈文峰。^⑥利玛窦来华时正是钟表技术和产品都已在欧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之后，他本人在罗马学院时就受过制钟技术的训练。利玛窦献贡的大自鸣钟摆锤很长，无处安放，只得在御花园里修建了一座钟楼，上面雕刻有金龙，是上千名工匠的杰作。为修此钟楼耗费了白银1300两。小自鸣钟放在皇帝的御几之上，万历随时可以玩玩。8天后自鸣钟停转，皇帝惊愕之后即令太监向利玛窦请教，后又派四人向利玛窦、庞迪我学习自鸣钟的调试方法。于是利玛窦、庞迪我居钦天监内，约一月余，教导四人操纵的方法。^⑦也许正是利玛窦在把西方钟表技术引入中国方面的贡献，后来上海一些古玩店里有将利玛窦说成是钟表匠的保护神，即钟表师把利玛窦尊奉为自己行业的行神。^⑧

耶稣会士来华，也把西方的食俗陆续带到了中国，如洋酒。澳门无疑是西方葡萄酒传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澳门记略》中就有关于葡萄酒的记述：“酒以白葡萄为上，红葡萄次之。所谓色如琥珀，气类貂鼠者。又有葡萄红酒、葡萄黄露酒，皆以瓶计，外储以箱。”同时，他们也在新建的教堂里酿造美味的葡萄酒。由于健康的原因，康熙在耶稣会士的推荐下，开始养成了喝洋酒的习

惯。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上谕中写道：“前者，朕体违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今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⑨天主教教堂的弥撒中要用红葡萄酒，教堂里往往有葡萄酒的储备，于是传教士纷纷向康熙进呈洋酒。如建昌府天主堂马若瑟格尔默斯一瓶，洋酒四瓶。临江府天主堂傅圣泽洋酒八瓶。抚州府天主堂沙守信洋酒六瓶。九江府天主堂冯秉正洋酒六瓶。赣州府天主堂毕安洋酒两瓶。^⑩甚至被康熙驱逐到澳门的多罗主教生前也亲自为康熙采办洋酒，1710年经赵弘灿奏称：由多罗采办的有加纳列国葡萄酒一箱70小瓶，伯尔西亚国葡萄酒两箱共20大圆瓶，波尔图国葡萄酒两箱共24方瓶。李天纲认为，康熙向传教士讨要葡萄酒的真实意义其实并不仅在于自己嗜好洋酒，而在于：在关于礼仪之争谈判破裂后仍然企图与传教士个人保持联系，也借此考验他们对清朝的服从态度。^⑪但不论康熙皇帝的动机如何，客观上是把洋酒引进到了宫廷，也正是由于康熙的嗜好，上行下效，地方上可以公然饮洋酒，传教士也可以在教堂里种植葡萄，如朝鲜学者洪大容在《燕记·东天主堂》中就记载了该教堂的庭院里设有轱辘的井，“每夏热，浓翠厚荫，如张重帘珠帐。秋熟，累累万颗，实为都下胜赏。酿酒有西法，香烈绝异，其护养之勤，专为酿酒用云。”^⑫传教士种葡萄主要是为了酿酒，当然也会在教堂里享用他的红葡萄酒。

四、肇庆教堂——西学知识传播的课堂

教堂文化包括了大量的西方知识，特别是西方风俗。如与教堂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传教士的服饰。《澳门记略》中描述了澳门各寺教士的服饰：“蕃僧不一，类三巴寺，僧削发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来澳，酋无与敌体者。有大事疑，狱兵头、蕃目不能决，则请命，命出，奉之惟谨。其出入，张盖树幡幢，僧拥卫之，男女见者辄前跪，捧足俟过，然后起，法王或摩其顶，以为大幸。”葡萄牙人行西历，每逢礼拜日，教堂内就会传出管风琴的鸣奏声，唱诗班的歌唱声；每逢节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是以血腥的方式将一些

公牛刺死。西方的节日最早也在澳门引入，在一些天主教的重大节日，街道上就会出现恭奉着“圣体”、圣像的盛大游行队伍。1563年复活节前夕，葡萄牙人举行了纪念圣妇凡劳涅克(Ste. Veronique)的盛大游行，由音乐、舞蹈和600余个灯笼、火把簇拥着的“圣体”引来了无数围观的中国人。有一名中国少年被感动得当即请求受洗。^①这些异国的奇风异俗给来到澳门的中国人以很深的印象。明清时期著名的学者徐光启入教后，也曾到澳门的圣保禄学院研修天主教义。画家吴历1680至1683年间也曾在圣保禄学院逗留进修，还留下了百余首诗。天主教的圣会、圣相游行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与传教士一同在学院学习的情景，不同语言和文字间的对比和沟通等都留在了他的诗里：“门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鸟爪，横看直视更难穷。”自注云：“西字如蝇爪，横行读之，尖疾者上。”^②

第一个在内地建造教堂的地方是肇庆。1583年利玛窦得到了肇庆知府王泮的通知，称两广总督已经同意他们的请求，并在肇庆西江北岸尚未建造好的崇禧塔附近拨出一块土地，作为他们的居室和教堂。裴化行写道：利玛窦“发挥务实才干，建造了一幢欧式小房子，名叫‘仙花寺’（或称‘非常圣洁的圣母堂’）”。^③这一采用欧洲建筑风格的肇庆教堂的开工，自然吸引了兴趣盎然的中国人的到来。利玛窦等在修造过程中，就在靠近工地的屋中摆上圣坛，在节日和星期天作礼拜。中国人一方面对这些“奇特的面孔”的外国人有着很深的戒心，同时对外国的新奇物品心生好奇，“他们称为无价宝石的玻璃三棱镜，凡是要看的都让看，还有书籍、圣母像和其他的欧洲产品，都由于新奇而被认为是漂亮非凡。”^④《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称：“这所房屋是用背砖和白灰筑成的，并称不上是一座带有西洋美术意味的典型建筑，但是，这是一所实用而又足以应付需要的建筑：它下层一共有五间，中间是暂时用作圣堂的一间客厅，每旁各有两间；上层是司铎们的主屋。”^⑤用作教堂的中央是圣坛，上面挂着圣母画像。利玛窦写道：“当人们去访问神父时，官员和其他拥有学位的人、普通百姓乃至那些供奉偶像的人，人人都向圣坛上图

画中的圣母像敬礼。习惯地弯腰下跪，在地上叩头。这样做时，有一种真正宗教情绪的气氛。他们始终对这幅画的精美称羨不止，那色彩，那极为自然的轮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态。”但同时也引起了中国文化人的不满，因为很快有一种流言，即认为利玛窦等是“把一个女人当作神来崇拜的”。于是利玛窦将圣母像从圣坛取下来，换上救世主基督的像。^⑥当然，也有不少人是把它与和尚庙混为一谈，到“寺”中进香，布施灯油和食品。

肇庆教堂的建立是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的一个巨大的胜利，耶稣会会长为教堂送来了一幅罗马著名艺术家绘制的基督画像，四件制作精致、样式美观的计时器。其中的座钟“成为整个中国议论和羡慕的对象”。日本区主教柯罗特送给教堂一幅由尼古拉(Giovanni Nichola)绘制的大型基督画像，尼古拉是第一位教导日本人和中国人学会欧洲画法的大师。菲律宾群岛的一位神父送来一幅精美的圣母画像，“这幅在西班牙画成的画，绘制美丽，观赏悦目，因为它熟练地调用本色，人物栩栩如生。”^⑦其中的一些西学展览品吸引了许多中国士大夫。如王泮经常带着一些高级官员去利玛窦等人的寓所访问他们，对他们带来的西洋物品，如三棱镜、圣母像、乐器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利玛窦等非常懂得利用印刷术和图书向文明民族传教的重要性，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教堂的寓所办起了一个藏书室，把已经获得的几箱子书，尤其是大厚本的教典法予以陈列，有一间房甚至摆满了四壁。除书籍外，还有圣母和救世主的油画和图片。“中国士大夫和官吏强烈贪求这类欧洲艺术品；王泮在绍兴的老父把儿子得自神父们的一幅美丽图片放在家庭小堂里。每天跪拜念经。”他们还向中国人炫耀编制的第一部葡萄牙文、意大利字母和汉文对照的词汇表。^⑧

肇庆教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教堂参观，一度成了岭南一带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的课堂。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我们的到来和欧洲远来异物的出现，消息一经传开就把很多人吸引到教堂来，更多的人是来参观我们的教堂而不是拜谒总督的。一些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钟当作新奇的东西，另一些人则把小钟当作新奇的东西。欧洲的图画和塑像、数学算法、浮雕地图，也吸引很

大的注意。我们的书，尽管是用中国人所不懂的语言排印的，却大受称羨，因为书的装订不同寻常，而且镀金美观，在中国完全是新东西。你把附有描绘性地图的书或者用图表和草图说明的建筑模型拿给这些人看时，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惊诧。整个国家连同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大庙等等在一本书中一览无遗，这种概念他们简直惊奇不已。他们对能够目睹这些分散那么广而且彼此相距那么远的光辉事物，而且能够在自己家里饱览它们，真是惊叹不已。同样的是，他们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所有这些的影响以及神父们始终是得体的谈话和议论，看来使他们足见对欧洲形成一个总的好印象。他们发觉，我们的科学从根本上比他们的更坚实，而且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知道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这样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①利玛窦在肇庆教堂陈列的绘有赤道南北半球、五带和五大洲的世界地图，第一次向中国士大夫引入了地理大发现之后形成的“世界意识”。^②正是在这些西方文化的吸引下，肇庆有40来名中国人成了教徒，“定期望弥撒，听礼拜日和节日的布道。”^③于是引起了官方的反感，肇庆岭西道因而奉制台明示：“本制台查得异域僧人来自澳门者日众，在我河岸建得一寺庙，内藏一轻舟，赖以多方游窜，刺探我内地情事，禀报澳门葡人。彼等极为狡狴且勤于工艺，加种种奇巧之技，博黎民之欢心，竟至无分昼夜咸趋赴之，听其宣讲散布不容于我中华之宗教。彼等神父日陈新艺，为诱骗昏昏者，继之以讲述各种科学或书籍。于大庭广众前且立一自动鸣响之钟。”^④由此可见，教堂文化的影响力已经使统治者感到了对传统的威胁。

五、教堂文化的北上及其影响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以澳门教堂为例：望德堂、圣老楞佐堂、大三巴、小三巴、唐人庙等，均为耶稣会建立；其他教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均只有一堂，势力不及耶稣会。自16至18世纪，由里斯本乘船至澳门的耶稣会士约400余人，再由澳门入华传教

者，有130余人。不独耶稣会，其他教会教士，亦多由澳门入华。而教徒则“盈万人”。^⑤

随着大批传教士进入内地，至崇祯十七年（1644），有教徒15万人，13省均建有教堂。康熙三年（1664）有教徒25万人，多明我会教堂有21所；1660年，方济各会教堂有13所；1667年耶稣会属下的教堂，全国有159所。黄贞《辟天主教书》记录了清初教堂林立的状况：“今南北两直隶，浙江、湖广、武昌、山东、山西、陕西、广东、河南、福建、福州、兴泉等处，皆有天主教会堂，独贵州、云南、四川未有耳。”^⑥可见沿交通线一带各省几乎都有教堂。利玛窦是沿着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上京城的，因此，沿交通线分别建立了一个个西式风格的教堂。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在肇庆建立的教堂，是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教堂。这个装饰共用去六百金的华丽教堂仅仅保留了5年11个月。1589年利玛窦在韶州建堂开教，至1607年已有教友800多，还印有《圣教日课》。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买屋建堂”，由于太小，1607年8月，李玛诺又买下较大的房屋为教堂。1599年4、5月间，利玛窦、郭居静建立了奉有天主圣像的简陋教堂。1610年王丰肃在南京建造了一西式圆顶无梁的华丽教堂。^⑦当时上海也是天主教传教活跃的地区，1609年12月24日之夜，是上海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徐光启和许多新教徒都到郭居静的小堂参加弥撒。17世纪40年代，潘国光还在徐光启的第四个孙女玛尔第纳的帮助下，购得南市世春堂，改建为中西合璧的“敬一堂”。徐光启的第二个孙女甘第大曾一次给潘国光银5500两，1658年资助建造松江教堂。^⑧17世纪在杭州武林门内建造的天主堂，是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主持兴建的，“造作制度，一如大西；规模宏敞，美奂美轮。”（《辩学》抄本）被认为是全国最大最华丽的教堂。^⑨

1605年利玛窦等在北京购地置屋，决定建一座漂亮的教堂。先后建有经堂和小堂。因为有了教堂，北京这个传教会中心就算建立了。当时的文人笔记中有过不少的记述，如《帝京景物略》称：“堂（南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廩，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

幔，俯倚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状，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矚，口容有声，中国画绘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盖帟，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⑥

清初对天主教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政策，特别是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特殊的关系，使天主教在北京的活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信徒达 15000 人之多。1650 年顺治皇帝赐宣武门内原利玛窦所建天主教堂旁的空地，准许汤若望重新修建新的大教堂，还赐银 10000 两为建教堂之用。满朝文武大臣均争相捐助。汤若望亲自绘制了大教堂的草图，并制定了具体的施工计划。1652 年，教堂终于建成。正式的名称为“无玷始胎圣母堂”。^⑦这座 20 米高的巴罗克式教堂，有一座圆顶，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新建的教堂很宽敞，圣堂长 8 丈、宽 4 丈 4 尺，内还设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传教士的住宅。4 米高的铁质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顶端，使人很远就能看到它。^⑧南怀仁不无自豪地称赞道：“连罗马都会为这样一座教堂的建筑而骄傲的，这是伟大的建筑艺术之一。”^⑨新的南堂落成后，顺治亲笔为南堂写了“钦崇天道”的匾额，1657 年还写了“通微佳境”的门额和御制天主堂碑铭，认为在南堂中所见的摆设、天主和耶稣像可以见出与中国文化迥异的西洋风格：“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⑩1656 至 1657 年间，顺治曾 24 次到南堂巡视，与汤若望长谈。汤若望成了京城举足轻重的人物，南堂不仅成了天主教徒朝拜的圣地，也是中外文人士乐于光顾的地方。

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游历北京时曾到南堂访问，《北游录》中有一段关于教堂文化的描述：“万历辛巳，欧罗巴国利玛窦入中国，始到筵庆。表贡耶稣像、万国图、自鸣钟、天琴等。庚戌卒，敕葬阜城门外二里。其徒先后至，严事天主。筑堂。其制狭长，上如覆幔，俯倚疏藻，绘诡异。供耶稣画像，望之如塑。右像圣母，母治少，手一儿，耶稣也。耶稣译言‘救世者’，一曰‘陡斯’。汉哀帝

元寿二年庚申生如德亚国。圣母玛利亚，本王族，童贞不嫁，忽娠天主，六十三卒。后三日复苏，升天，天主年三十三上升。其教耶稣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传法者曰‘撒贵而铎德’。（如利玛窦等。）奉教者曰‘契利斯当’。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玛窦亡，其友庞迪我、龙华民辈，代主其教。今汤氏（即汤若望）尤见重。登其楼。简平仪、候钟、远镜、天琴之属。钟仪具铜质，远镜以玻璃，琴以铁丝。琴匣纵五尺，衡一尺，高九寸，中板隔之。上列铁丝四十五，斜系于左右柱，又斜梁，梁下隐水筹，数如弦，缀板之下底，列雁柱四十五，手按之，音节如谱。其书叠架，茧纸精莹，劈鹅翎注墨横书，自左而右，汉人不能辨。”^⑪18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在北京任职的史学家赵翼也曾生动地描述了南堂：“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耶稣，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突出，似离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其他还有洋琴、自鸣钟等。^⑫清人赵怀玉《亦有生全集》诗集卷 13 “游天主堂”中的“峨峨番人居，车过常远眺”，说得就是南堂。清代来华的朝鲜使团的成员也多乐意到南堂参观。如金景善的《燕轶直指》称该堂外观“制甚奇巧”；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记录了自己参观教堂内部的感受：“入门便觉丹碧眩耀，目难定视。既是像天上者，故其高几摩星汉，其画日月星辰故也。壁上多画阴鬼，有同禅房十王殿，见之幽暗，无阳明气象，可怪也。”李德懋的《人燕记》中对南堂壁画的描绘更为细致：“有一儿眼睛直上做惊痫之状，一妇人抚摩忧愁，一老翁恐惧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又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百气，直射妇人之顶。……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⑬洪大容在乾隆三十年（1765）两度参观南堂，他在《燕记》中写道：“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求见，则西人辄欣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可见朝鲜使团成员访问参观是非常频繁的。他自己“由正阳门内循城而西，行数

里，望见天梁高屋，制作神异，已不觉耸瞻。”教堂内“两壁画楼阁人物，皆设真彩。楼阁中虚，凹凸相参，人物浮动如生，尤功于远势，若川谷显晦，烟云明灭，至于远天空界，皆施正色。环顾口然，不觉其非真也。盖闻洋画之妙，不惟巧思过人，有裁割比例之法，专出于算术也。画中人皆披发衣大袖，眼光炯然。”^⑥

除南堂外，清初还有建于顺治年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用皇帝所赐府第和钱款改建的西洋式教堂——圣若瑟堂，因地处城东，又称东堂。雍正元年（1723），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将自己占地40多亩的寓所改建成“圣母七苦堂”，即所谓“西堂”。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意大利建筑风格、气势恢弘的教堂。^⑦1693年康熙因患疟疾，吃了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提供的金鸡纳霜而恢复了健康，同年赐蚕池口地给张诚、洪若翰、刘应等，1703年建成北堂，又名“救世堂”。这座花了4年时间建成的教堂，被认为是“东方最美，活动最频繁的大教堂。”据法国传教士杜德美给巴黎一位神甫的信称：“这座教堂一进门是一个四十法尺宽、五十法尺长的院子，两旁的屋子比例适中，那是两间中式大厅，一间作聚会和讲经布道用，另一间作会客用。在会客厅里，挂有我们法国国王、耶稣、法兰西各君王、当政的西班牙国王、英国国王等画像，及好几个其他君王的画像，还有一些数学仪器和乐器。大厅里还有已经出版的名著中收集到的美丽雕像，这些雕像向全世界展示了法兰西宫廷的宏伟壮丽。……教堂内部建筑有两个层次；每个层次有十六对涂成绿色的柱子；下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大理石的，上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镀金的，还有柱子的顶端，柱顶盘的上楣、中楣、下楣也都是镀金的。柱顶盘的中楣上有许多装饰画，其他的顶饰凹凸不平，色彩和光度也有所不同。上层两边各有六个很大的拱形光窗，使得整个教堂非常敞亮。教堂顶部都画满了。它分三个部分：中间是一个敞开的结构复杂的穹顶，大理石圆柱带着一排拱形光圈，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大理石本身和一些置放得当的花瓶一起被摄入另一幅美丽的图画之中；永恒的天父受礼捧着地球，被一群天使蜂拥着高高坐在云彩之中。”教堂吸引了许多怀着极大的兴趣前来参观的

中国人和虔诚的教徒。法国著名的画家、后来成为乾隆宫廷画师的王致诚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现在北京的这些“欧式建筑”的教堂，“宏伟壮丽，装饰很美，油漆锃亮，就像为欧洲许多大城市增添光彩的那些教堂一样。”^⑧洪大容的《燕记》中也专门记述过“东天主堂”，特别称颂过郎世宁所绘的壁画：“入堂，其器物之奢，逊于西堂（这里‘西堂’指南堂），而壁画之神巧过之。北壁亦有天主像，毛发森森如生人，前有两人立侍。始入门，望见半壁设采龕，安三塑像，心异之，以为塑像之妙非佛像所及。及至其下而摸之，则非龕非塑，乃壁画也。西壁画天主遗事，有新死小儿横置于棺上，少妇掩面而啼，其旁四五人环伏而哭之。乍见措愕却立不忍视，真画妖也。”^⑨1675年7月21日，康熙皇帝骑马前往在京的耶稣会士的教堂——南堂，并为南堂题写了“敬天”二字。^⑩

北京所建的教堂和形成的教堂文化，对于地方上教堂建造和教堂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和保护作用。随着各地天主教人教人数的日益增多，据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称在利玛窦死时，“中国大部分省城和大城市，都有教堂，基督徒有几千名”。有的著作甚至说各地已经有了三百多个传教会，“在利玛窦死时，中华帝国内有三百多处都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⑪据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给拉雪兹神父的信，1704年各教会在广州的教堂有7座：“一座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它是七座教堂中最早建成的教堂，两座圣方济各会的教堂，两座外方传教会的教堂，一座奥古斯丁教派神父的教堂和一座我们的教堂。”^⑫杨文信考证出其中有耶稣会的“太原堂”、方济各的“扬仁里天主堂”和“朝天街天主堂”、广州天主堂和奥古斯丁会的“全能堂”。^⑬广州教堂文化形成了对传统的冲击，有人对此感到愤怒并向总督告状，指责“这座教堂夹在他们的房屋和亭楼中间是对他们的侮辱”。但总督则回答说：“皇上在北京他自己的皇宫里允准为上帝造了一座漂亮的教堂，我怎么能在广州推倒一座给上帝的教堂呢？”^⑭一些西式建筑在澳门、广州、扬州、安庆等地甚至影响了民间建筑的样式，如广州的十三洋行。扬州也有仿西式建筑的澄碧堂、水竹居、左靠山。澄碧堂仿自广州十三洋行碧

堂。水竹居也有西式的喷水池。安庆南门外王氏花园，“承重处仿造西洋立柱法”，作重台叠馆。18世纪中叶以后西式建筑在广州成批地出现，中式房屋被“改造精工，招诱夷商投寓。图得厚租。”政府虽有禁令，然而也难阻止。^④很显然，教堂文化使中国人初步领略了西方文化的综合面貌，并由此最早意识到了中西文化的异质性。

六、结语

天主教教堂文化最早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唐朝景教寺的建造。据说当时长安“法流十道，寺满京城”，但可考的似乎只有北京房山区三盆山的景教十字寺。^⑤元代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约翰·孟特·科维诺（Joan du Monte Corvino, 1247—1328），曾在中国建造了几所教堂，“并根据《新旧约》绘制图画述说天主的奇妙工作，使从未听说过这些神迹的无知之人凭借这些图画认识天主及其奇妙工作。”14世纪初在泉州也“建一十分雄伟华丽的教堂”。^⑥可惜，这些零星的资料无法让我们真正复原那一时代的教堂文化。

1497年伽马率领4艘船舶和100多名水手组成的远航队，于7月8日离开里斯本，11月22日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卡利库特（Calicut，即郑和船队到达的“古里”），标志了东西航路就此已联成了一片。地理大发现尽管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航海探险活动，但它所发生的影响却是广及世界，深入到全球的各个领域。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知识空前的拓展。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呈点状分布的已知世界，彼此衔接起来，形成了面状分布的已知世界。由于岭南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特别是15、16世纪形成的地理大发现使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处在欧亚大陆的远西（Far West）的葡萄牙，和处在这个大陆的远东（Far East）的中国的最早的交汇点就是岭南。

综上所述，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弥撒、礼拜、信徒婚配和受洗等圣事的纯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西方建筑艺术、钟表制作和酿酒技术、音乐、绘画和雕塑艺术展示的场所。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形态中复合元素最多的物化形态，教堂文化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天主教经典与仪式，而且给岭南人带来了与天主教教义和仪式紧密结合的西方的建

筑、音乐、绘画、雕刻、工艺和部分民俗景观，给中国人以一种身临西方文化其境的真切感受。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钦差、工部尚书杜臻巡视澳门，其《香山澳》诗云：“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火烧水运经营惨，雕墙峻宇开通衢。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金碧荧煌五采合，珠帘绣柱围蛟螭。”^⑦教士的精神、教堂的壮丽外观、精美雕塑的神像和奢华的堂内布置给了杜臻一种综合的美感。同时，通过招揽中国人入堂参观地球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表等，使教堂成了西方传教士最早对中国人进行西学知识传播的课堂。利玛窦正是在肇庆教堂里第一次为中国人展示了世界地图，传播了地圆说等。吴历也是在三巴寺不仅学习了宗教教义而受洗入教，同时也在那里学习了拉丁语。可以说，岭南的教堂文化也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当然，教堂文化作为一种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异质文化，也使中国人对自己熟悉的的文化秩序遭到威胁而感到忧虑，明清以来的许多教案中，一般民众往往把教堂首先视为攻击的目标，多少透露出教堂文化给中国传统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教堂文化首先在岭南登陆并非偶然。岭南文化可以分为潮汕、客家、广府、海南四大群落。历史上的岭南土著文化一直不是岭南的主流文化。处在中华文化边缘的岭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在融合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边缘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岭南文化的特点使岭南人在接受西方教堂文化的过程中，具有比较健康和积极的心态。他们不仅接受了这些具有彩色玻璃镶嵌门窗的哥特式和有着精致砖雕的巴洛克式的教堂风格，而且还把这些西洋艺术风格与传统的中国艺术融于一炉。在岭南成功引进的教堂文化，后来又随着西洋传教士的北上，而沿着交通线推向了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把包括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在北京扎下了根，为清代艺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①②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62页。

③④⑤ 林子升编《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114、113、132页。

⑥⑦⑧⑨ 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记略》下卷《澳

蕃篇》。

④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6-477页；邓开颂等著：《澳门沧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⑤黄鸿钊：《澳门史》，第477页。

⑥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蕃篇》；邓开颂等著：《澳门沧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⑦⑧⑨屈大均：《广东新语》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36-37、36、37页。

⑩《澳门记略》上卷《官守》。

⑪[法]伯德莱著、耿升译：《清宫洋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⑫陈衍虞：《莲山诗集》，道光十九年补刊本，卷二，第10页。

⑬⑭⑮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6、51-53、201、14页。

⑯《粤东编》卷三，《志外夷》页二十下（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⑰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⑱⑲赵翼：《簞曝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36-37、36-37页。

⑳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54页。

㉑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㉒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第314页。

㉓刘圣宜、宋德华：《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㉔[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08-410页。

㉕②③④⑤⑥⑦[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8、88、101-102、115、122页。

⑧⑨黄伯禄：《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1884年。

⑩参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75件，《江西巡抚郎廷极奏折》，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第103-104页。

⑫⑬[韩]洪大容：《燕行录选集》，上卷，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年，第315-316、315-316页。

⑭《吴历评传》，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第636页。

⑮⑯⑰⑱[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4-165、168-169、194、216页。

⑲[法]裴化行著，萧瀚华译《十六世纪天主教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48页。

⑳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46页。

㉑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十山湾印书馆，1938年，第301-304页。

㉒阮仁祥、尚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6-618页。

㉓⑳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9、429-430页。

㉔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3-154页。

㉕⑳转引自黄时望：《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载《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㉖⑳佟尚主编《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0、296-297、301-302、6-7页。

㉗[德]达素彬：《通玄教师汤若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㉘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45-46页，引文标点本文作者略有改动。

㉙[韩]洪大容：《湛轩书·燕记·刘翰问答》，景仁文化社，1969年，第269-281页。

㉚[奥地利]科兰尼：《敬天：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中赐给南怀仁的礼物》，载《南怀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20页。

㉛George H. Dunn: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Nort Dame Press, 1962, P62、67.

㉜[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㉝杨文信：《雍正年间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岭南的发展与挫折》，“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论文，抽印本。

㉞[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214-218页。

㉟杜臻《经纬堂诗集》，康熙间刊本，卷四，9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更正

2002年第9期第92页内文第2段第5行“出使美国、葡萄牙、秘鲁……”，应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特此更正。

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

作者: [邹振环](#)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200433](#)
刊名: [学术研究](#) PKU | CSSCI
英文刊名: [ACADEMIC RESEARCH](#)
年, 卷(期): 2002, "" (11)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44条)

1. [费成康](#) [澳门四百年](#) 1988
2. [林子升](#) [十六军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 1998
3. [印光任](#). [张汝霖](#) [澳门记略](#)
4. [黄鸿钊](#) [澳门史](#) 1999
5. [邓开颂](#) [澳门沧桑](#) 1999
6. [黄鸿钊](#) [澳门史](#)
7. [印光任](#). [张汝霖](#) [澳门记略](#) 1999
8. [屈大均](#) [广东新语](#) 1985
9. [〈澳门记略〉上卷〈官守〉](#)
10. [伯德莱](#). [耿升](#) [清宫洋画家](#) 2002
11. [陈衍虞](#) [莲山诗集](#)
12. [朱静](#)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 1995
13. [查看详情](#)
14. [陶亚兵](#) [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 2001
15. [赵翼](#) [曝杂记](#) 1982
16. [许明龙](#) [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1993
17. [姚元之](#) [竹叶亭杂记](#) 1982
18. [章文钦](#) [澳门历史文化](#) 1999
19. [刘圣宜](#). [宋德华](#)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 1996
20. [利玛窦](#). [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 1984
21. [裴化行](#). [管震湖泽](#) [利玛窦评传](#) 1993
22. [黄伯禄](#) [正教奉褒](#) 1884
23.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475件, [〈江西巡抚郎廷极奏折〉](#) 1998
24. [李天纲](#) [中国礼仪之争](#)
25. [洪大容](#) [〈燕行录选集〉](#), 上卷 1960
26. [吴历评传](#) 1984
27. [利玛窦](#). [金尼阁](#). [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 1983
28. [裴化行](#). [萧涪华](#) [十六世纪天主教传教志](#) 1936
29. [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2000
30.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1938
31. [阮仁泽](#). [高振农](#) [上海宗教史](#) 1992

32.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 1985
33. [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1983
34. [黄时鉴](#) [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 1998
35. [佟洵](#)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1999
36. [达索彬](#) [通玄教师汤若望](#) 1989
37. [谈迁](#) [北游录](#) 1997
38. [洪大容](#) [湛轩书·燕记,·刘鲍问答](#) 1969
39. [科兰尼](#) [敬天: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中赐给南怀仁的礼物](#) 2001
40. [GeorgeH Dunn](#):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Ming Dynasty](#) 1962
41. [杜赫德](#). [郑德弟](#)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2001
42. [杨文信](#) [〈雍正年间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岭南的发展与挫折〉,“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论文,抽印本](#)
43. [阿·克·穆尔](#). [郝镇华](#)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1984
44. [杜臻](#) [〈经纬堂诗集〉,康熙间刊本,卷四](#)

引证文献(2条)

1. [姚晔](#) [从澳门宗教建筑看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期刊论文]-[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2. [邹振环](#) [明末南京教案在中国教案史研究中的“范式”意义——以南京教案的反教与“破邪”模式为中心](#)[期刊论文]-[学术月刊](#) 2008(5)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yj200211019.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dac6349-a162-4e87-a2f3-9e4d00847a3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